

迥异；社会个体化发展趋势使得“附近”难以重构，非遗存续的社会价值被消解。面临“多代”并存的社会状态，非遗保护如何抉择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需要重新研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体系中，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利用的逻辑起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遗产持有者的日常生产生活事项。但随着多代社会的形成，加之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口流动的快速增长、乡村社会的优化重组，以及社会行动的个体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需要重新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从文化的“守正创新”角度，分层次地表述与认知。“守正”即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保持遗产的原真、活态；“创新”即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满足不同主体的多元化、时代化、个体化需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去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正创新”，将可以突破因代际差异带来的非遗保护传承的张力，进而实现从地方社会的“小共同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升华。

影像激活非遗研学的“三重门”^{*}

巴胜超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 重庆 401331)

如何借助影像的影响力，从非遗影像生产的深度与影像激活非遗传承的可能路径，达成民族地区非遗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多赢？笔者认为，非遗研学旅行是面向下一代传递非遗核心价值的重要手段，非遗影像是激活非遗研学质量的时代路径；而以影像激活非遗研学，需要推开“三重门”，即影像引流、影像引学和影像记学。

在短视频、流量、网红、娱乐主导的“流媒体”时代，与“非遗”相关的影像生产，看似热闹非凡、出圈不断，但从非遗核心价值传播的角度看，存在商业化、符号化、碎片化等问题。

第一，商业化。非遗影像多被用作商品，追求流量和经济回报。这为非遗保护提供了资金，扩大了传播面，但也容易导致内容为迎合市场而走样，比如把庄重的祭典简化为“表演秀”，或让传承人被迫生产快消内容。

第二，符号化。网红的非遗视频中，非遗被提炼成简单、易记的视觉或听觉标签。比如“泼水节”视频仅聚焦泼水狂欢的热闹场面，“火把节”则聚焦篝火晚会的狂欢场面，这种方式虽降低了大众认知门槛、便于快速传播，却忽略了非遗背后承载的复杂的地方知识和完整的民俗仪式，最终导致“非遗”文化被扁平化。

第三，碎片化。非遗脱离其生活语境，被剪辑成零散的、去背景片段。短视频中 15 秒的工艺流程、30 秒的节日舞蹈，往往难以展现一场仪式完整的时空流程，或一件作品从准备材料到完成的漫长创作过程。这让观众难以形成对非遗技艺的系统性、整体性理解，反而容易制造对非遗的刻板印象。

非遗研学是“非遗+旅游+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形式。相较于侧重技能培养的“非遗研培”与注重素养提升的“非遗研修”，非遗研学更强调其作为校外教育活动的全过程性，因此用“非遗研学旅程”来表述，或许更为贴切。

在中国，非遗研学伴随研学旅行政策的推行而发展。2013 年，《国民旅游休闲纲要》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2016 年，《教育部等 11 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将研学旅行明确为校外教育活动，并要求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标志着其正式成为全国性政策。

^{*} [作者简介] 巴胜超，男，云南曲靖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文化人类学。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老铁路沿线非遗协同保护与边疆文化治理研究”（25EH282）。

非遗研学的雏形初现于2014年相关政策,通过“传统文化教育”“研学旅行”等表述奠定基础。2017年后,“非遗+研学”模式得到明确倡导。《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提出鼓励非遗进校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要求开展“研学游”活动。2020年以来,北京、四川等地先后出台专项政策,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也明确强调推动非遗与研学旅行深度融合。

当前,非遗研学呈现三大发展趋势:一是课程体系化,从单一体验逐步拓展为系统课程;二是文旅融合深化,与乡村旅游、文博场馆等多元场景结合;三是数字化赋能,利用VR、AR等技术增强研学的互动性与传播力。

非遗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推动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非遗与教育的“珠联璧合”,是非遗传承发展的重点。我国在非遗融入教育领域已开展了一些尝试和实践,如“非遗进校园”“研培计划”等。随着文旅融合的持续深化,研学旅行逐渐成为非遗融入教育的创新实践。

例如:大理白族扎染研学打造的“非遗+旅游+研学”一体化实践,不仅提供扎染历史讲解、技艺体验(扎花、染色等),还融合白族文化(三道茶、霸王鞭、八大碗等)构建非遗的沉浸式体验;河北蔚县剪纸研学采用“政府专班+多部门联动”模式,结合红色研学、乡土文化,打造“研学+餐饮+文创”产业链;山西大阳古镇非遗研学采用“非遗活态传承+文创体验”模式,以百工坊提供的点翠、扎染、掐丝珐琅等20余项技艺体验项目,推动传统工艺现代化创新;广西北海贝雕研学则强调“非遗+海洋文化+环保”的理念,探索“非遗+文创”路径,提出编制多语种非遗科普手册方案,助力非遗的国际传播。

在云南,除白族扎染研学,还有诸多案例可圈可点。如丽江东巴文化研学,以“非遗+历史+民族团结教育”为特色,参与者可学习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东巴造纸术,感受古城文化魅力。元阳梯田农耕文化研学,以“非遗+农耕+生态教育”为特色,参与者可学唱哈尼古歌、学习织布与扎染技艺,参与收割、抓稻花鱼等稻作文化体验,结合梯田生态保护知识科普,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感。此外,昆明市文化馆推出的“匠心染趣”扎染亲子研学,以“非遗+亲子互动+公益推广”为特色,传承人现场教学,亲子共同制作扎染作品。既增强了非遗传播的公益性,又促进了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

非遗研学市场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些研学项目内容与大众旅游类同,非遗元素单一,多为走马观花的体验,研学线路变成了团队打卡游、美食游。还有些项目研学深度不足,研学过程“见物不见生活”,往往以制作一个器物为重点,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器物背后承载的遗产智慧、思想、情感的传递。

简言之,当前非遗研学存在3类问题:一是研学政策方面,尽管有政府支持、市场需求增长,研学主体参与意愿较强,但组织者(中介机构)普遍盈利动力不足;二是研学项目过度商业化,表现为研学旅游化、研学主体游客化,文化失真(非遗价值失真),研学内容同质化、模式化,且多停留在美食游、打卡式体验,缺乏文化深度。三是研学教学与传播层面,存在传承人老龄化、青年传承人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同时在研学过程中对非遗价值的传递不足,市场推广不足,国际影响力有限。

从影像激活非遗研学旅行角度,提出影像参与非遗研学的“三重门”提议。

第一重门——影像引流,即从非遗研学推广角度出发,构建多元化非遗研学推广渠道,包括传统媒体、新媒体、社区活动、学校合作等多种形式,形成全方位的推广网络。在传统媒体方面,可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扩大非遗研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可在黄金时段或重要版面进行宣传,提高品牌曝光率。在新媒体领域,则可借助微信、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以短视频、图文、直播等形式,展示非遗文化魅力与研学成果,吸引年轻受众关注;特别是抖音、B站等平台,凭借年轻化、高活跃的用户群体,成为展示非遗动态美和技艺细节的载体。

第二重门——影像引学,即从研学教学角度出发,在非遗研学过程中增加非遗影像作为教学内容的分量,达到影像引导非遗价值传播的功能。非遗传承多依赖口传身授,而影像能完整、动态地记录技艺全过程和文化空间,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直观的视觉文献,为研学者提供具象的视听材料。高质量的影像作品可作为标准化的非遗研学教学辅助资源,弥补师徒口传的局限。同时,非遗影像进入校园和社区,能培养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感,激发他们参与传承的兴趣。在短暂的研学时空(一周或两周),借助非遗影像深入了解项目的文化变迁,通过影像在短期内熟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成长史、学艺史、传

承史和贡献史,是“影像引学”的核心所在。

第三重门——影像记学,即把非遗研学的过程设计为非遗影像的制作过程,让非遗研学的参与者以导演、摄影师身份,将所见、所闻、所感的非遗项目,制作为一件具有深度的影像作品。在智能手机普遍流行的语境中,“影像记学”的可行性为:人人都能拍摄,都有智能手机,都会剪辑,人人成为非遗影像的制作者和传播者。目前,已有“浙东运河纪录片研学、川西影像记录·社会调研营、切龙中寨公益影像研学游、用小米手机看见乡村非遗”等诸多探索实践。简言之,“影像记学”的目的,是借助影像技术,使研学者从非遗的学习者、体验者,向非遗的记录者、传播者更新迭代。

总而言之,中国非遗研学游已从“单一体验”转向“文旅+教育+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模式;云南作为中国非遗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近年来积极推动非遗研学游发展,形成了“文化+旅游+教育”的融合模式。当前,当地优秀案例普遍实现了“非遗技艺传承+文化IP开发+在地旅游引流”的三维联动,但非遗研学仍需解决商业化过度、传承断层、产品同质化等问题,推动其从“网红”走向“长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文化治理特质^{*}

张翠霞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新时代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实践。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文化领域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范式,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路径,更是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社会科学回应国家重大战略的知识生产,文化治理视域下的非遗保护研究,已受到民俗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彰显了社会科学对国家治理和文化遗产的现实关切;在社会实践领域,我们看到当代非遗保护已经超越单向被动的保存式保护,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传承群体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逐步形成协同共治的运行格局,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治理特质。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具有凝聚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传承中华民族文脉、提升文化软实力、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功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涵盖民俗技艺、节日礼仪、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等诸多形态,是最具生命力与群众基础的文化形态。文化治理与非遗保护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契合性。中国于 2004 年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回望 20 余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不再局限于抢救与保存,而是在应用、发展和创新中将非遗保护延伸至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多个治理场域。可以这么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实践。

我国非遗保护已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多元协同共治的现代化格局。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与统筹作用,作为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者,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长期规划及专门机构设置,自上而下开展普查、项目申报、传承人认定与资金扶持,并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搭建跨领域、跨区域协同保护平台。其次,市场成为重要赋能力量。非遗与文旅、文创深度融合,非遗体验、文创开发、主题旅游等业态蓬勃兴起,推动非遗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形成特色“非遗经济”,在活化

^{*} [作者简介] 张翠霞,女,云南大理人,云南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治理、乡村治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滇藏茶马古道沿线集市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YB2023024)。